

杨再喜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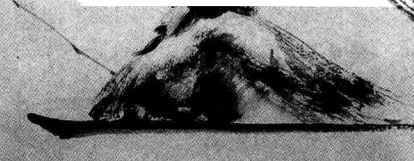
唐宋柳宗元传播接受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杨再喜 著

唐宋柳宗元传播接受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柳宗元传播接受史研究/杨再喜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5161-2583-0

I. ①唐… II. ①杨… III. ①柳宗元(773~819)—古典诗歌—诗词研究—中国—唐宋时期②柳宗元(773~819)—古典散文—文学研究—中国—唐宋时期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712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陈肖静
责任编辑 陈肖静
责任校对 王洪强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
插 页 2
字 数 268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高楠

《唐宋柳宗元传播接受史研究》所研究的对象柳宗元及其文学与文论，虽然已有不少人作过研究或正在研究，但这本书所取的接受视角，所揭示的我国古代文学及文论接受的历史整体性根据，以及研究中运用的以大观小、小中见大的流转式研究方法，都不乏新意，并富于启发性。

我国古代留下一些作品的文人和文论家浩若星河，其中产生长远影响和重要影响的人物及其作品其实并不是很多，每个时间跨度较长的朝代也就那么几个人，十几个人。他们成为各自那段历史的代表，用他们的生平与成果言说着他们的那段历史，后来的研究者们便通过对他们的研究，揭开历史的奥秘。这种研究是一项赋历史人物以生命的工作，历史人物在有功力的研究中获得历史的现实生存。这里的关键便是研究者的功力，便是既入于史又立于现实的学识与修养。泥于史书，执于前言，述于成述，这只是初始的学，是未化的识，但却不是究，即未究其历史延续的所以然，这当然就更谈不上研了，研者，发也，发他人所未见。孔子总是担心自己授教的泥与执，于是便有了他传而不习乎的自省。所以，就文学史研究而言，基于研究者当下语境，秉持不同于前人或他人的研究角度与研究方法，对文学史中那些有代表性的研究对象作以研究，这才是正道，倘若这研究又能沉稳扎实，钩沉取极，其活化与深化文学史的成就，便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出于这样的理解，读杨再喜这部《唐宋柳宗元传播接受史研究》，尽管他当初以其中要点而写作博士论文时，作为他的导师我便对其中要点多有所了解，但时隔五年再次读这些并不陌生的内容，依然有振奋与喜悦感随卷生出，感受到一种生命活力的激发。柳宗元是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代表

性人物之一，他是诗文并盛的人物，他的儒学根底，佛道修养，穷途而守节义的人品，“文以明道”的文学主张与实践，以禅入诗文的艺术境界，以及被誉为“柳子厚体”的文体建树，使他备受刘禹锡、杜牧、司空图、王安石、欧阳修、苏轼、黄庭坚、严羽等这些文学史上的大家的推崇与追随。面对这样的研究对象，很容易使自己的研究被压抑在前贤论定的圈子里，咀嚼他人之咀嚼，言说他人之言说；或者，像当下常见的浮躁之文那样，逞肤浅粗知之虚狂，做一番踩着前贤肩膀横批竖侃一番前贤的手脚。这种情况在阐释学中被称为阐释对象的强光效应。《唐宋柳宗元传播接受史研究》没有受到这种强光效应的影响，这当然得益于作者对柳宗元的深透读解，但这种读解又并非止于传统的微言细解与大义通悟，因为恰恰是止于传统的细解与通悟才难以躲开既有的强光效应，本书另辟蹊径地取了个传播接受史的视角及研究方法。固然，从传播接受角度研究文学史中的代表人物，也包括柳宗元，本书并非开先河者，本书传播接受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它做到了将这一研究贯穿到唐宋柳宗元的接受史中。史的研究要点是梳理，梳理即梳出个方向，理出个秩序，不同的研究视角及研究方法，会取不同的梳理方向，像环视周围环境一样，不同方向便会有不同景物被收入眼底，和其他视角及方法相比就会另有所见。即便所见有所相似，其中的要点及重点也会不同，这就是新发现。既然所见不同，所梳理的史的秩序亦即脉络自然也就不同；而史不过是一系列被记载下来的，已彼此在时间上并无衔接关系或自然延续关系的事件，它们需要根据某种承继关系，相似关系、因果关系、语境关系及波及或影响关系进行著史者的联组，这就是史的秩序的联组关系的建立过程。这就是梳理过程，梳理过程的根据中就包括研究的视角与方法。从这重意义说，本书在收集与理解材料的阶段，便已致力于传播接受视角的坚持与贯彻，这在本书作者为本书的前身——博士论文选题及开题中，即已表现出他另辟蹊径的艰难，但这同时又激发他不断有所发现的振奋和喜悦。因此，及至本书所面对、所研究的关于柳宗元的材料，关于由材料所见的柳宗元，便更有了不同于别的视角研究的另一番景象。把这些不同时代、不同接受者对于柳宗元的接受材料加以沟通，加以联结，由此系结的历史接受脉络，就更不同于从其他角度用其他方法所系结的关于柳宗元的历史脉络，这是对于柳宗元的不同时代不同接受者的不同接受关系、接受状况的梳理，这是一条接受与评

价柳宗元所独有文学史价值的新路。不言而喻，新路能求得新的通达，能见于新的沿途风光。由此，本书向读者揭示了柳宗元“文以明道”观的“明”的历史去蔽要点及“道”的时代敞开要点，构筑了一个“道”因文而“明”，“明”因文而“道”的接受学景观，即是说，本书有说服力地告诉读者柳宗元所深刻地把握并阐释的“文以明道”是唯有在接受关系中才能实现其“明”的效果和“道”的衍生与传播的。这样的发现，超越了对于柳宗元“文以明道”观的静态孤立思考的、铺展注释式的传统理解。对于“韩柳并称”问题，本书运用接受视角与方法，进行接受的历史语境的追问，同样有说服力地提供了韩愈与柳宗元在“文之于道，道之于时”的宗于经的传统理解中，更强调“文之于道”的当下时代性的共识与共践，因此在彼此融通的接受中二者得以历史齐名的根据。

在我国古代，文学写作具有历史一统性的延续关系，不同时代的文学家都是沿着宗经崇圣的命定之路而来，并且都是沿着“文以明道”的那套“明”的思路而来，并进而保持着文体学的审美趣味的范畴一统性。如大家都历史延续性地认为道之所明，不仅语之未尽而且意犹未尽，因此才需要立象以明道，才追求言外之意，也才在景中见情，物中求志，史中取意示理；文气说、传神说、片言居要说、象外之象说、趣味说，等等，才因此获得普遍性的历史理解，才成为历代文学家共循的理路，共成的修养，共求的境界；而不同时代的文学家，又都是在这样的共循、共成与共求中探求着各自风格，获取着各自建树。这便是我国古代文学特有的历史定性。从接受说，这也同样是历史一统性的，文学创作的那套一统性规定同时也便是文学接受的历史一统性，二者彼此互生互动又融为一体，这是文学与接受的历史整体性的融合。因此，西方强调差异性 & 个性的接受学理论，用于中国古代，便收获着于差异性 & 个性的接受批评中显现大一统的历史整体性的效果；或者说，从传播接受角度及运用接受学方法所进行的我国不同时代的接受批评研究，均应以大一统的历史整体性为旨归。这在理论研究中运作起来并不容易，它要由历史整体性的把握出发，要深入到不同时代不同批评话语的理解中去，并且要在批评接受的时代差异性 & 个性差异性中始终把握住蕴含其中的那个历史整体性，再随着研究的推进而把它概括出来，对研究对象史的评价才能因此而得出。《唐宋柳宗元传播接受史研究》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它牢牢抓住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接受

与批评者共同关注的三个因素，即柳宗元的政治生涯，对儒释道的态度，以及他的文学主张，并将其贯穿到不同历史时期及不同个体接受的接受过程中去，对之进行要点性思考与梳理；同时，它又抓住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性接受与批评个体的代表性接受与批评，进行接受学的解释，力求从接受角度理解与把握其中的精髓；进而，本书又在此基础上，提出各自的具有柳宗元接受史意义的问题，将之放入具有历史整体性的语境中，求得历史整体性的解答。这是一个发于历史整体性又归入历史整体性的对柳宗元接受的阶段性研究与个体性研究。这种研究既合于我国古代文学接受与批评的历史状况，又合于对柳宗元接受与批评的历史过程，由此得出的结论既有新意，又有令人信服的力量。如本书根据柳宗元的历史接受状况，把唐、五代作为柳宗元传播接受研究的第一个时期，突出其中的两个特征，即先是寂寞无声而后又文名掩其诗名，对这两个特征进行问题式求解，通过柳宗元的身世分析，当时政与文的时代关系分析，以及“永贞革新”前后的语境分析，将问题纳入文学史的历史整体性来思考。这样的研究，使学界早已熟知的柳宗元的生平事迹，当时经由柳宗元倡导的“古代运动”，以及“永贞革新”前后的时代状况、文坛状况，均在接受的历史整体性中获得了新的意义，并在问题求解中有了新的作用。在这里，起重要作用的，便是对柳宗元，乃至对整个古代文学，具有接受意义的历史整体性的观照。如对杜牧的“韩柳”并称论及司空图的深远论，本书设专节阐释，阐释既坚持古代文学接受的历史整体性，又将之具体化为杜牧及司空图各自的接受状况，由此揭示与评价他们的研究对于柳宗元的文学史价值。对杜牧的“韩柳”并称，本书由韩愈对柳宗元的“知人论世”的接受方法转入杜牧的“比较之法”，指出后者的韩柳并称，是建立在经由比较而突出的特征基础上的，是对历史整体性不同时代个性接受的特征性并称，这便是富于新意的阐释。

《唐宋柳宗元传播接受史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特征须予指出，即本书研究柳宗元的接受史，又不囿于他的接受史，而是将之放入文学的历史演变及文学接受的历史演变中，以变求变，以历史与文史之变，求解柳宗元接受史之变，由此获得以大观小的效果；同时，本书又以柳宗元接受史研究中的问题为端点，对之进行传承性或动因性思考，寓具体研究的变化性于历史与文史演进的传承性中，使历史与文史的传承性成为伴随柳宗元接

受史研究的若隐若现的背景性脉络及语境性脉络，这又是小中见大的研究效果。比如具有历史意义及文史意义的政治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文与道的关系问题，被接受的文本作者的人生经历与道德水平和接受状况的关系问题等，这类问题，其实都是文学史及文论中极富我国古代文学与文论特征的代表性问题，同时也是对柳宗元文学与文论接受史具有历史整体性影响的代表性问题，本书在这种以大观小、小中见大的柳宗元接受史研究中为这类问题的求解，作出了富有启发意义的努力。

《唐宋柳宗元传播接受史研究》也有进一步开掘的空间，有待本书作者杨再喜的继续努力。如柳宗元生前寂寞身后名的知识分子命运问题，这里有一种历史机制，不少文学家与文论家都有这种经历，历史的演进过程对于他们成为一个随着时间推移愈显其名的接受过程，这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历史整体性，其中的历史机制在柳宗元身上有集中体现，如果能就此深入进去，会更增添本书的史论价值。再有，“文以明道”的抒情与感物形态，在柳宗元的接受史上是占有显著位置的，本书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但这类问题如何从文体学角度深入研究，是学界柳宗元研究的一个问题，而文体学又正是与接受学相对应的课题，也是接受学所依凭的对象性课题，在这方面如能思考得再深入些，本书的学术价值会更高。以杨再喜在本书中见出的学识与学力，求解这类问题，应该是关注则有所得的事。

2013年4月 沈阳

目 录

序	(1)
导论	(1)
第一节 关于文学接受史	(1)
第二节 柳宗元传播接受史研究的现状与突破	(4)
第三节 影响柳宗元文学传播接受的三个因素	(8)

上篇 唐、五代柳宗元传播接受史

第一章 唐、五代柳宗元传播接受的特征	(21)
第一节 沉寂的时代	(21)
第二节 文名掩其诗名	(27)

第二章 同官尽才俊,偏善柳宗元

——韩愈在柳宗元传播接受史上的奠基作用	(33)
第一节 对柳宗元人品道德的推崇,奠定了接受的基础	(33)
第二节 对柳宗元文学成就的肯定,确立了应有的地位	(35)
第三节 对柳宗元文学作品的效仿,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37)
第四节 对柳宗元政治生涯的复杂态度,导致后世持续 不已的争论	(45)

第三章 诗情与友情的楷模

——刘禹锡对柳宗元诗歌的传播接受	(48)
第一节 在诗歌唱和中接受了柳诗的思想感情和诗体特征	(48)
第二节 志趣相投在诗歌主题和表达技巧上的接受	(52)
第三节 在对故友的深情缅怀中引发对其生活方式的向往	(54)

第四节 编著遗稿写作序言,奠定了柳宗元传播接受的 文献基础	(56)
--	------

第四章 柳宗元在晚唐、五代的传播接受	(57)
第一节 杜牧的“韩、柳”并称论	(57)
第二节 司空图的“深远”论	(62)
第三节 官方史书的复杂态度	(66)

下篇 两宋柳宗元传播接受史

第五章 唐宋柳宗元传播接受之比较	(71)
第一节 传播接受的态势:由“寂寞”走向了“热闹”	(71)
第二节 传播接受的轨迹:出现了第一个“拐点”	(74)
第三节 传播接受的方式:由“韩、柳”并称到“文章四大家”	(77)
第四节 作品接受的命运:诗歌和散文呈现出明显的分野	(84)

第六章 柳宗元诗歌传播接受的开创者梅尧臣	(88)
第一节 转变接受态度和开拓新的研究方法	(88)
第二节 肯定艺术成就,接受其诗文和精神	(90)
第三节 相同的身世感慨和执着于人生的态度	(92)

第七章 柳宗元传播接受“拐点”的开拓者王安石	(96)
第一节 将其位列于继“孔、孟”之后的儒家圣人	(96)
第二节 赞扬其“能自强以求列于后世”的人格精神	(97)
第三节 称其为文学史上的“豪杰可畏者”	(98)
第四节 一脉相承的文学思想和惊人相似的道德才能	(106)

第八章 欧阳修与柳宗元的文学关联及其思想差异	(110)
第一节 同为“穷而后工”论的践行者	(111)
第二节 文艺思想的共鸣	(113)
第三节 文学创作的借鉴	(116)
第四节 哲学思想的差异	(119)

第九章 苏轼对柳宗元诗歌的大规模接受及其艺术启迪	(122)
第一节 大规模接受风气的开启	(123)
第二节 高超的接受艺术的启迪	(127)
第三节 原因探析	(132)
第十章 柳宗元接受史上接力棒的重要传承者	
——黄庭坚	(140)
第一节 承传和深化关于“韩、柳”、“陶、柳”同流的文学观	(140)
第二节 心追手摹柳宗元	(144)
第三节 接受的语境	(147)
第十一章 以柳宗元为代表的“文道观”在宋代的承传与转关	(152)
第一节 唐代古文运动中“文以明道”观的提出	(153)
第二节 “文道观”在两宋的承传	(154)
第三节 “文道观”在两宋的转关	(157)
第十二章 宋代接受视野中的“韩、柳”并称论	(161)
第一节 文章之士与“韩、柳”并称论	(161)
第二节 道学之儒与“韩、柳”并称论	(164)
第三节 宋代“韩、柳”并称的文化成因	(166)
第十三章 南宋时柳宗元在唐宋古文体系中的历史地位	(168)
第一节 理学家眼中的柳宗元	(168)
第二节 柳文的版本与选集	(170)
第三节 柳宗元与唐宋“文章四大家”的确立	(173)
第十四章 中兴诗人对柳宗元诗歌的接受	
——以陆游为例	(176)
第一节 引禅入诗,相同的艺术意境	(176)
第二节 相似的题材,相近的情感意蕴	(178)
第三节 对柳宗元诗文的深入阐释和高度评价	(180)

第十五章	严羽《沧浪诗话》与柳宗元诗歌之接受	(183)
第一节	第一次将柳宗元作为“元和诗坛”的代表作家	(183)
第二节	首次从诗学角度探讨了柳诗与屈骚之关系	(186)
第三节	以人论诗,首提“柳子厚体”和“韦柳体”	(189)
第十六章	宋人接受柳宗元诗歌在理论上的成熟	
	——以刘克庄《后村诗话》为中心	(191)
第一节	在苏轼“陶、韦、柳”并提的基础上,突出柳诗“凄怆”的 情感特点	(191)
第二节	在同韩愈等诗歌的比较中,称誉柳宗元为“本色诗人” ...	(194)
第三节	对柳宗元政治操守和人品道德的全面肯定	(197)
第四节	通过纵向比较,将柳宗元位列诗歌史上的“百世之师” ...	(200)
结语		(203)
附录一	湖湘语境下柳宗元对杜甫诗歌的接受	(205)
附录二	从柳宗元看历史文化名人的广告效应	(223)
附录三	柳宗元由何处改贬永州辨	(231)
主要参考文献		(235)
后记		(241)

导 论

目前，随着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编写“大文学史”的呼声甚高。我们所谓的“大文学史”包括创作史、接受史和批评史等方面。文学创作史提供了素材，是学习和研究的基础；文学接受史描述读者群体对作家和作品的阐释批评及继承发展；文学批评史是在接受史基础上的理论概括，因此文学接受史联系着文学创作史和文学批评史，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具有桥梁的作用。当传统文学史的研究面临困惑时，人们希望运用新的方法来“重构文学史”。如今在接受美学和生态文艺学等学术视野的启示下，从接受的角度（读者的角度）研究文学，已经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这个领域充满了无限的潜力。柳宗元接受史研究正是在这个大的学术背景下开始蹒跚学步，一路走来。

第一节 关于文学接受史

在传统文学史的研究中，“人们往往注意了文学作品是如何产生的，而忽略了它们是如何被接受的，忽略了读者的接受在文学产生过程中的作用，从而将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简单化、片面化”。^① 现今这种静态式、共时性的研究方法正在被突破，人们把作家和作品只看作是整个文学系统中的一个环节，同时还注重从文学接受的角度进行研究，把作家的接受轨迹进行动态的、历时性的展现，认为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讲“文学史应是文学作品接受史”。^② 为何要对文学的接受史进行研究？现以本书研究的对象柳

① 尚学锋等：《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② [德] H. R. 姚斯等：《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9页。

宗元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简单概述。

首先,由理解的相对性所决定的。根据现代阐释学原理,人们对柳宗元的研究不可能回到文本中的“柳宗元”,只能根据时代的变化,探究被后世读者不断解读的“柳宗元”。这是因为理解是相对的,是由理解的不确定性因素所决定的。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在于“前理解的差异性”,也就是理解前的一个准备因素。它包括读者的知识经验、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体验、审美趣味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因人而异,即使为同一人也因时代而异,所以“前理解”是缤纷复杂、千变万化的,这样就会形成“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柳宗元’”的现象。(2)在于“语言功能的有限性”。理解的对象(文本)是一种语言符号的存在,理解的主体(读者)是一种掌握了语言的存在。文学语言的无穷意味来源于它的成象功能,即一般不直接说明本意而是首先成象,所以古人讲“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周易·系辞》)和“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王弼《周易略例·明象》)。可见语言的职能在于“尽意”和“明象”,在于描绘一个个鲜明的形象,而不是直接说明作者的思想。但形象是一个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戴叔论语,转引自司空图《与极浦书》)的东西,处于似真似幻而难以言传的状态;同时我们必须明白,语言虽然是人类的伟大创造,但相对于丰富复杂的大千世界而言,它是单调和微不足道的。语言的自身也存在着许多矛盾,例如语言的社会性与私人使用性之间存在着矛盾,语言在本质上是公共的,不是私有的,有着社会的统一性和规定性,私人的语言是不存在的,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一个事实:语言是供个人(私人)使用的,社会是不可能说话和写作的,个人(作者)只能选择社会意义中的一个,这导致后世读者在解读同一文本时不一定会选择同一个意义,必然会带来理解的多意性和相对性。(3)在于“间距”,就是读者与文本(作者)之间永远存在着一个距离,无法也不可能消除,也就是说,后人永远也无法设身处地地回到作者所生活的时代,后人面对着文本只能凭借自己的知识经验和审美趣味思之度之,驰骋想象,遥作追忆罢了。(4)在于“认识的循环性”。后人对文本的解读,永远是一个由局部到整体,又由整体到局部的不断深入、不断循环的过程。所以对于柳宗元的研究也是一个不断开放、不断生成的过程,这种研究永远不可能停滞在一个人的手里,也永远

不可能终止于一个时代。^① 因此，这种借助柳宗元接受史的研究可以纠正约定俗成的偏见乃至错误的看法，可以对柳宗元的思想品格和文学成就有着更为正确的认识。这同美国学者韦勒克所讲的意思相一致：“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一个累积过程的结果，也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作品批评过程的结果。”^②

其次，文学艺术是一个循环的生态系统。新兴的生态文艺学认为文学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开放的生态系统。所谓生态系统就是：“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的范围内，生物成分和非生物成分之间通过物质、能量或信息的交流，构成的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生态学功能单位。”^③ 在文学艺术的整个过程中，包括了宇宙社会、文学艺术家、文学艺术作品和文学艺术的鉴赏批评四个环节。它们彼此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构成了一个个生生不息、郁郁葱葱的生态系统。一个作家在后世的传播接受情况，有的虽声名显赫却只是昙花一现，有的生时默默无闻而身后却享有盛名。作家在后世的传播接受境遇主要取决于读者接受的态度。现今，柳宗元已巍然屹立于中国文学史上，成为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家，而事实上相对于同时代的白居易、韩愈、刘禹锡等而言，他在唐、五代时除了在朋友之间有限的传播接受外，知道柳宗元的人非常少，并且在史著中对柳的为人大多持贬毁的态度，只是到了宋代才声名日显，在其后的接受历程中也起伏沉浮不断，传播接受的内容也日渐丰富、错综复杂。对柳宗元传播接受史进行研究的意义，正像美籍学者宇文所安讲的一段话：“如果我们的文学史写作是围绕着‘重要的’作家进行的，那么我们就必须问一问他们是什么时候成为‘重要作家’的，是什么人把他们视为‘重要作家’的，根据的又是什么样的标准。”^④ 柳宗元的文学地位不是跨越时空的客观存在，而是经历了漫长的社会传播和广泛的读者接受，他的名声和文学地位是读者赐予的。

再次，适应了文学研究的目的。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里，史学的目

① 参见苏州大学王全福教授的学术讲座。

② [美] 韦勒克等：《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35 页。

③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1 页。

④ [美] 宇文所安：《瓠落的文学史》，转引自刘东《中国学术第三辑》，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239 页。

的在于通过实录的事实,提供认识生活规律的依据,给后人以经验或教训;哲学的目的在于对自然和社会的理性思考,发现和探究人生的意义;文学的目的在于激发人的情感,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对于作者的思想是如何激起读者的共鸣,作品的艺术是如何滋润读者的心田,这应是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文学接受史是沟通文学创作史和文学批评史的桥梁,我们既可以研究作者的情感 and 艺术,也可以研究读者对作家和作品的态度和反应,同时由于联系着文学批评史,还可以深化对文学规律的认识,对文学现象进行理论的升华。我们在进行接受史研究的过程中,可以结合当时的学术文化背景和读者自身的人生历程、审美情趣、精神气质,通过开拓学术视野,“能更全面、更完整、更系统地去展示、去解释一个作家在同一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阶层和不同的阶级中的接受,去了解、去判断一个作家在不同的社会思潮和不同的学术领域中的作用和影响,从而确定他在不同时代中的精神坐标位置”。^①

第二节 柳宗元传播接受史研究的现状与突破

目前,国内接受史的研究大致开始于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在理论著作方面有周宁、金元浦译著的《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朱立元的《接受美学》等。在宏观研究方面有尚学锋、过常宝的《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陈文忠的《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等。在具体的古典作家的接受史研究方面有李剑锋的《元前陶渊明接受史》、杨文雄的《李白接受史研究》、尚永亮的《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朱丽霞的《清代辛稼轩接受史》等。对于古典作家的接受史(本书把传播史与接受史统一进行,参照了尚永亮老师的研究方法)研究正成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热门。我们认为,每一个伟大的作家都应该有一部完整的接受史,这对于文学史乃至文化史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柳宗元是一位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文学家,在文坛的影响已达一千余年,同时还是一位思想家和政治改革家,对他的肯定与否定、褒扬与贬毁的评论贯穿着接受史的始终,接受史的内容越丰富多彩,在文学接受史的研究中也就越有重要意义。

^① 高中甫:《歌德接受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环视柳宗元传播接受史研究，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大多为单篇的文章，停留在对个别作品或宏观的研究上，完整系统的理论专著至今尚未见到。现就有关柳宗元传播接受史研究的相关论文作简要介绍：王锡九的《宋人对柳宗元诗歌的评述》，认为宋人对柳宗元诗歌的认识和接受，是随着宋诗自身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欧阳修、梅尧臣等充分肯定了柳诗刻画山水、抒写忧愤的特点；苏轼高度评价了柳诗“简古”、“淡泊”的艺术特征。北宋后期的江西诗派从章法、句法、字法等形式技巧上探讨了柳诗。邱美琼的《柳宗元诗歌接受的三个维面》一文认为：关于柳诗在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上，形成了三个主要接受维面：对柳诗风格的评论、知人论诗和比较研究。陈文忠的《柳宗元“江雪”接受史研究》，以柳宗元的单篇作品作为研究的对象，解读了《江雪》在宋、明、清三代的接受情况，认为苏轼为该作品的“第一读者”。张明非的《论苏轼对柳宗元的解读》一文，通过对柳诗的情景关系、意象选择等方面的具体分析，解读了苏轼关于柳诗“枯淡”的评论，有别于常见的关于柳诗“清竣”的见解。郭连花（马来西亚）的《历代咏柳宗元的诗》一文，试图从历代咏柳宗元的诗来窥探柳宗元的为人、技艺、文学渊源、诗风和写作心态等如何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洪迎华博士的学位论文《刘柳诗歌明前传播接受史研究》对刘禹锡和柳宗元的诗歌在明代以前的传播接受进行了宏观上的比较研究，多有新见，对于柳宗元传播接受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不是柳宗元的专题研究，同时还只停留在诗歌方面，柳宗元作为一个伟大的古文家，对此方面的研究却涉及不足，她的单篇论文《柳宗元诗歌当世传播效应分析》认为，柳宗元是古代诗歌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但这并不代表他在唐代元和时期就是著名的诗人，他在其生前并不是以诗人而闻名的。作者解读了柳宗元诗歌在此时期的传播途径、传播环境、传播机遇和传播意识等方面。

另外，一些研究者探讨了柳宗元对于老庄、屈原、司马迁、陶渊明等前人的接受情况。如刘洪仁的《柳宗元辞赋对屈赋的继承和发展》、吴正岚的《论屈原与柳宗元的精神契合》、刘继才的《柳宗元与陶渊明比较论》、陈琼光的《创“骚”与学“骚”——兼论屈原对柳宗元的影响》、曾日升的《论司马迁对柳宗元的影响》等论文。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充分肯定以上学者对于柳宗元接受史研究的开创